

跨文化研究的多学科意义

——读《美国华裔批评家刘禾“新翻译理论”研究》

梁新军

从中国近现代史来看，中外之间的跨文化沟通在语言交往形式方面的体现确实远非“翻译”这一概念所能涵盖。如刘禾所说，其提出“跨语际实践”概念，目的在于“重新思考东西方之间跨文化诠释和语言文字交往形式的可能性”^①。刘禾的这一考量侧面反映出了以往的“翻译”概念在描述晚清以来中外语言文字交往形式方面上的局限性。所谓“跨语际实践”，在刘禾这里，正是对晚清以降中外之间复杂的语言文字交往形式的整体描述。作为一个新的描述性术语，“跨语际实践”在指涉复杂的历史现象上无疑优于“翻译”。不管是狭义的“翻译”还是广义的“翻译”^②，“跨语际实践”在内涵上都更为宽泛而灵活。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一书中虽未仔细界定“跨语际实践”有哪些具体方式，但从其讨论的对象看，它无疑包括了除翻译外的跨语际借用、改写、诠释，以及跨语际的写作、阅读等，如鲁迅对外来文学形式和技巧的借用、对国民性话语的文学化诠释，杜亚泉对“个人主义”话语的改写，老舍在《骆驼祥子》中对自由间接引语的使用。刘禾创制“跨语际实践”这一术语，还意在凸显实践主体在此种活动中的能动性。为此，她发明出另外两个概念来取代以往翻译术语中的“本源语”（source language）和“目标语”（target language），即“客方语言（guest

①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修订译本，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0页。

② 如图里在描述翻译学中的界定。他认为目标语文化中以翻译面貌出现或目标语读者认为是翻译的一切文本都可被视作“翻译”。详见 Gideon, Tour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p.32。

language) 和主方语言 (host language)。按其说法, 这是为了突出在之前的概念中被压抑的目标语言本身的能动性, 以消解本源语-目标语概念中暗含的“目的论式的目标”。她认为这种目的论将译入语中的实践主体的能动性降低到了次要位置。

刘禾认为, 两种语言的互动, 主要是主方语言中的翻译者从客方语言中邀请、选择、组合乃至重新发明各种词语和文本, 以主方语言中的主体需求来决定或协商从客方语言中抽取何种意义^①。她认为“非欧洲的主方语言在翻译的过程中被客方语言所改变的同时, 既可能与之达成共谋关系, 也可以侵犯、取代和篡夺客方语言的权威性”^②。这样, 本源语中心的本源语-目标语等级关系在刘禾的重新界定下几乎被逆转了, 翻译成了一种以译入语主体需要为旨归的跨语际表意实践, 译语的实际意义由译入语中的主体决定, 不完全受制于译出语的意义本身。

刘禾借用新术语对语言等级关系的“逆转”行为, 如果一定程度上确实打破了传统翻译研究中的本源语中心主义, 从而赋予目标语言(她称之为“主方语言”)以前所未有的重要性, 那么她显然并不满足于此种后殖民主义意义上的胜利。实际上, 在《跨语际实践》一书中, 刘禾也批评了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几种跨文化研究思路。她认为, 萨义德的“旅行理论”忽略了翻译的作用以及非西方语言的能动性, 妮兰雅娜(Niranjana)的“后殖民翻译史观”无意识中强调了欧洲语言的重要性, 拉费尔(Rafael)的后殖民翻译研究使东西方的边界绝对化了, 并把东西方的权力关系简化为本土抵抗与西方统治^③。批判地反思了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后, 她提出自己的看法: “非欧洲的语言并不自然地构成抵抗欧洲语言的场所”, “人们极大地忽视了非欧洲语言

① 刘禾:《跨语际实践: 文学, 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 1900—1937)》修订译本, 宋伟杰等译, 第36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 第27—33页。

所经历的共谋、抵抗和挪用的复杂过程”^①。由此，刘禾提出“跨语际实践”研究思想。她把“跨语际实践”这一复杂的历史互动现象设定为研究对象（涵盖面大大超出了翻译），并发明“客方语言/主方语言”这一对概念来突显主方语言的能动性，研究焦点也转到考察“新的词语、意义、话语以及表述模式，如何由于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的接触/冲突而在主方语言中兴起、流通并获得合法性的过程”^②。相比于后殖民批判、传统的翻译研究、比较文学研究而言，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研究在对象和问题设定上都进行了新的置换。比诸传统的翻译研究，她坦诚“对等词自然而然存在于各种语言之间，这是……一个普遍的幻觉”^③，她拒绝介入可译性是否存在这样的形而上学争论，其问题设定变成了“人们通常所设想的对等关系在具体的语言之间是如何建立并保持的？在历史上让不同的语言互相对等的行为究竟服务于什么需要？”^④。比诸比较文学研究，她表示“旨在跨越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所能做的仅仅是翻译而已”^⑤，以此暗示传统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层困境。刘禾的超越企图在于，她试图以话语实践研究为切入口，避开“二元对立范式的罗网”。在《跨语际实践》序言中，她直白地批评：“那种预先限定了何为现代、何为传统的旧范式在许多有关东西方关系的当代历史写作中依旧阴魂不散。”^⑥

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研究设想，并不单纯是一种新的翻译研究或比较文学研究的思路。在根本上，她有着宏大的企图破解东西方跨文化研究之困境的方法论诉求^⑦。在《跨语际实践》之后的《语际书写》一书中，刘禾这样表达她的学术焦虑：“中国学人处在当今剧烈

①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修订译本，宋伟杰等译，第33页。

② 同上书，第35页。

③ 同上书，第4—5页。

④ 同上书，第21页。

⑤ 同上书，第1页。

⑥ 同上书，《序》第4页。

⑦ 同上书，《序》第5页。

变动中的全球文化格局里，应承担何种角色？或不承担何种角色？在跨语言、跨文化的学术和学科史研究中，中国学人能做出怎样的独特贡献？”^①刘禾并没有停留在叩问上，而是通过一系列深入的个案研究，相继提出一批新的理论术语，如“互译性”、“交换的符码”、“衍指符号”等。通过这些术语的提出，她实际上已经在建构一种新的跨文化研究范式。这些新的术语，在“跨语际实践”之后，继续把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意识向前推进，其所探讨的历史对象也越来越超出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的范畴，而跨入到更广泛的国际关系史、文化研究和学科史研究的领域。2005年出版的《帝国的话语政治》一书，我们实际上已经很难给它作传统学科意义上的分类了。继《跨语际实践》和《语际书写》之后，刘禾虽然把研究的视野扩大到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之外，但在问题视角和方法路径上依然延续着“跨语际实践”的研究思路。我们甚至可以说，其最新的“衍指符号”这一术语，正是对“跨语际实践”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在近代史中的具体化。“互译性”、“交换的符码”则是在“跨语际实践”和“衍指符号”这两个重要术语间的过渡。这一系列术语间明显有前后承接的关系。刘禾总的学术诉求，通过这一系列概念显示出，仍是在试图解决东西方之间（尤其是中西之间）跨文化、跨语际的话语实践问题，并试图作出方法论乃至研究范式上的概念性提升。

有着敏锐理论意识的刘禾，并非只是想单纯地探讨中国近现代史上那些复杂的跨语际实践问题。熟稔诸种“后”学的她，在探讨中国近现代史和文学史的诸多问题时，始终保持着与中西方学术传统对话的意识。她对立足于西方知识传统的后殖民研究、语言哲学理论、中国研究等都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并力图在这基础上，发出某种基于中国现代历史处境的独特声音。她的言说对象显然指向西方学术界，并在事实上启示着中国当代学人该以何种姿态面对西方。在2017年的《语

^①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修订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4页。

际书写》修订版序言中，她援引李陀的话写道：“在今天，完全以西方知识传统作基础和背景，来讨论‘全人类’或‘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那种时代是否应落下帷幕？‘全球化’的压迫是否应使人们考虑寻找新的立场和方法讨论文化交往与知识建构的问题？”^①李陀对此问题似乎已作了一定的回答，他认为：“刘禾提出的‘互译性’理论似乎是以汉语的变革为主要研究对象，但这个理论的意义显然大大超出了汉语和中国思想史的范围。我以为它或许为在当代语境中如何发展认识论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②李陀提及的“互译性”理论正暗示出了某种“新的立场和方法”。

所谓“互译性”，其实并不复杂。它意指不同语言互译中词语之间的“相等”，即一种人为设定的对等性，用《跨语际实践》中的话说就是“虚拟的等值关系”。刘禾基本上认为不同语言间的词语的对应是历史地、人为地建构起来的，我们必须把它们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去研究，而不能抛开历史做抽象的讨论。“互译性”的概念无疑是“虚拟的等值关系”的简约化说法，它是跨语际实践研究的具体切入口，即由这种历史上具体的词语互译（如以“个人主义”来译“individualism”）入手，来探讨中国近现代史上跨语际的话语实践问题，并侧重考查话语实践中的主体诉求（即刘禾所反复表述的实践主体或主方语言的能动作用）。

作为“跨语际实践”研究设想的一个早期概念，1997年提出的“互译性”在后来演变成了更为具体的“衍指符号”。如上文所说，“衍指符号”作为“跨语际实践”研究思想的一个具体化概念，它主要指中国近现代史中跨语际翻译行为所建构而成的某种固定意义链条，刘禾所举的典型例子即“夷/barbarian”。在《帝国的话语政治》一书中，她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讨论“夷”字问题。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英国人对汉字“夷”实施了禁令，规定“嗣后各

①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修订本），《序》第2页。

② 同上书，《代序》第6页。

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在这一条款的英文版中，英国人把汉字“夷”放在当时的罗马拼音“i”和英文翻译 barbarian 之间，使这三个符号形成某种固定的意义指涉，汉字“夷”的意思遂以英文为准被固化为了 barbarian（野蛮人）。刘禾认为，这种纠正或者固化中文语义的方法，不但造就了一个全新的中英文衍指符号，而且赋予了这一衍指符号以法律保护，并使英国人据此为由禁止中国人称英国或英国人为“夷”。事实上，经过刘禾的考察，汉字“夷”在中国经典文献中的语义并非固定的，也没有明确的“野蛮人”意思，1832年前英国人（主要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官）也大都把“夷”字翻译成中性的“foreign/foreigners”。“夷”的本义，据刘禾分析，主要是在动词的意义上“命名主权统辖的文化政治边界”^①，它主要是一种界定主权的功能性概念，而非贬低性的名词性指称^②。1832年后，英国人把“夷”字理解成某种贬低性的“barbarian”，并非常执着地要求中国禁用此字指涉英国或英国人^③，其实正反映了英国人的某种忧虑。刘禾认为：“在当时的英国人眼里，西方以外的社会一律被划为野蛮的或半文明的状况，汉字‘夷’则来路不明，它的到来似

① 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修订译本），杨立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00页。

② 王宏志教授并不认可这种说法，认为“夷/barbarian”并不构成所谓的衍指符号。因为鸦片战争前的晚清皇帝（如乾隆）及官员们对英国使团和商人确有鄙夷和防备之心，在诸多的谕令、奏折及官方文书中，晚清皇帝及官员明显流露出对所谓夷商的鄙夷态度，如“夷性狡诈”“狡黠夷商”等，当时在华的英国人如马礼逊等也都明显感受到了被鄙夷的处境，他们对“夷”的理解绝不是简单的中性概念。因此王教授反对把“夷/barbarian”视为一个衍指符号。见王宏志：《说“夷”：十八至十九世纪中英交往中的政治话语》，陈思和、王德威主编：《文学·2016春夏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09—307页。方维规教授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夷就是一个表示低劣性的文化符号，与 barbarian 在意思上相似，两者的对等不是“建构”的。见方维规：《一个有悖史实的生造“衍指符号”——就〈帝国的话语政治〉中“夷/barbarian”的解读与刘禾商榷》，方维规：《文学话语与历史意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51—262页。

③ 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高级官员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就曾抗议“夷”的使用，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时英国方面也要求禁用“夷”字，1858年中英签订《天津条约》“夷”字禁令终于被写入条款。

乎混淆了本来很清楚的文明和野蛮的分野。”^①欧洲人在殖民运动开展后为了在认识论上维持殖民地他者的文明低劣等级，大都把非欧洲的种族称之为“savages”或“barbarians”，进而为自身的殖民行为提供合法化依据，而汉字“夷”则使西方的这种殖民话语逻辑有遭到逆转的危险^②。总之，本来只用来指称非西方社会的“barbarian”，现在却被用来指称西方社会自身，这无论如何不能不使英国人感到忧虑甚至恐惧。

刘禾不惜用一百多页的篇幅详细分析“夷 / barbarian”这一衍指符号，她的用意不外乎是想以此为典型个案，揭示衍指符号背后的某种权力关系或文明等级关系。实际上，类似的衍指符号还有“中国 / China / 支那（日文） / 支那（中文）”等，刘禾在书中也做了深入分析。通过这些案例，“衍指符号”分析作为跨文化研究的一种新路径，确实显示出了某种方法论意义，指示出一条较为可行的跨文化研究新思路。这种新思路正是对早年“跨语际实践”研究思想的深化和具体化，其学术启示无疑是多学科的。《帝国的话语政治》一书中，刘禾所讨论的对象早已超出了单纯的文学或思想史领域，而涉及了国际法、符号学、宗教、语言学、视觉文本研究等。

“跨语际实践”研究思想经过二十多年来不断拓展的多学科化实践和方法论提炼，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跨文化研究范式。它不仅在问题视角上颠覆了诸多传统学科的经典假设，如翻译中的“可译性”、比较文学中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化设定、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普适性、国际法中的普遍人权观念等，更在根本上转换了问题视角。它不再承认某种不证自明的普遍性，反而追问普遍性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在方法论方面，“跨语际实践”研究思想也显示出了自觉意识，如上述所论及的一系列新术语的提出。刘禾以大量的、多学科的个案

① 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修订译本），杨立华等译，第43—44页。

② 同上书，第89页。

研究，实践了她的方法论，具体而微地演绎了如何进行有效的“跨语际实践”研究，无疑使其新范式更具可操作性。

费小平教授的《美国华裔批评家刘禾“新翻译理论”研究》一书系统地描述了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研究思想的发展脉络，对其多学科的意义多有阐发。“新翻译理论”的命名虽然并非出自刘禾本人^①，但某种程度上确实指出了刘禾“跨语际实践”研究思想的要义。“跨语际实践”在内涵上虽然大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但无疑，翻译正是其最主要的形式。“新翻译理论”的命名对翻译研究领域而言，在针对性上更为明确，这对反思旧的研究范式、更新问题视角无疑能带来积极启示。

① 费小平：《美国华裔批评家刘禾“新翻译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页。